

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对李嘉图等价之谜的中国经验分析

许先普

(湖南理工学院 社科部, 湖南 岳阳 414006)

摘要:基于消费跨期最优化框架,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消费者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及私人消费支出与政府支出之间的相关系数。对中国数据的分析表明:短期内,李嘉图等价不成立,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即政府支出增加将导致居民消费增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短期内是有效的;长期内,政府支出将完全挤占居民消费支出,因而支出政策不宜用于实现政府的长期经济目标。

关键词:政府支出;居民消费;李嘉图等价

中图分类号:F81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750(2010)01-0006-06 **收稿日期:**2009-10-01

作者简介:许先普(1982—),男,湖南湘潭人,湖南理工学院社科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货币金融理论。

基金项目:湖南理工学院科研项目(2009Y57)

一、引言

政府支出是否会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很早就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从结论上来看,大致可分为支出中性说与支出非中性说两种观点。支出中性说一般认为李嘉图等价^①成立,即只要政府支出和外债的规模保持不变,政府融资方式(征税或发行债券)的变化就不会影响居民消费。如 Barro 基于跨期新古典增长模型分析框架认为,如果消费者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能够正确地认识到政府的筹资行为对未来收入的影响,则政府支出不会影响居民的消费水平^[1]。Ramey 和 Shapiro、Burnside、Mountford 和 Uhlig 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美国的数据展开经验研究,认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并不存在长期影响^[2-4]。支出非中性说认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替代关系或互补关系。Bailey 最早肯定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认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5]。Kormendi 和 Aschauer 使用一个长期收入

决定模型对美国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美国的政府支出同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6-7]。Ahmed 在使用跨期替代模型对英国的数据进行研究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8]。Amano 和 Wirjanto 利用相对价格方法估计了美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发现美国 1 单位政府支出增加将导致 0.9 单位的居民消费减少^[9]。Barro 基于均衡宏观经济模型从短期与长期两个方面分别展开研究,认为政府支出的增加在短期内将导致居民消费的暂时增加,而在长期中政府支出将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10]。Tsung-WuHo 则利用面板数据对 OECD24 个工业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在单一国家中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并不存在规律性的结果,但在对多国数据进行分析时,结果表明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11]¹⁰⁶。以上研究证实了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

^①李嘉图等价即 Barro-Ricardo 等价定理,说明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总需求没有影响,是无效的。

之间存在某种替代关系,但也有一些研究得到了二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的结论。Karras 通过对多个国家的经验研究发现,由于政府支出的增加会促进收入的增加,提高居民消费的边际效用水平,因而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12]。Devereus 在规模报酬递增、寡头竞争假定前提下研究了政府支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发现政府支出增加将导致总产量水平上升,而总产量水平的上升又导致工人实际工资的上升,从而导致消费对闲暇的替代,于是政府支出增加导致了居民消费的增加^[13]。Frenkel 和 Razin 运用跨期分析方法发现,政府支出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居民消费:消费倾斜渠道和资源撤出渠道,而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则取决于通过以上两个渠道所产生作用的相对大小^[14]¹⁵⁵⁻⁴⁰⁶。国内学者刘溶沧、李广众、李永友、申琳和马丹等从支出非中性角度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研究^[15-18]。由此可见,由于不同国家的实际经济情况不同,学者们在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有效性问题上至今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

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借鉴 Turnovsky 与 Frenkel 和 Razin 的分析思路^[19]²⁵⁻¹⁰³^[14]¹⁵⁵⁻⁴⁰⁶,并引入居民消费的不确定性因素,从理论和经验分析的角度探讨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 Barro-Ricardo 等价的适用性。全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将建立一个带有不确定性因素的消费者跨期最优化理论模型,并简要分析政府支出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第三部分是选取经验模型及变量数据,并进行简要的描述;第四部分是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对理论模型结果进行检验;最后一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

二、理论模型

(一) 基本模型及求解

考虑一个处于无穷期界封闭经济中的代表性个体,该个体对商品的消费将影响自身的效用。另外,为引入政府角色,假定政府支出可直接影响居民效用的变化^①。因而代表性个体的效用就同时受到个人实际消费及政府支出的影响。具体来说,个体偏好可用如下预期贴现效用函数表示:

$$E_0 \sum_{t=0}^{\infty} \beta^t U(c_t^*) \quad (1)$$

上式中, E_0 为代表性居民基于 0 期所有信息对未来的预期算子, β 为贴现因子, $U(c_t^*)$ 为即期效用函数,它给出了个人在特定时期的效用, c_t^* 为 t 期居民有效消费,它包括人均实际消费及人均实际政府支出两部分。假定个人即期效用函数形式为常相对风险规避效用函数,即:

$$U(c^*) = \frac{c^{*1-\delta}}{1-\delta} \quad (2)$$

其中, δ 为该效用函数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即 $-c^* U''(c^*)/U'(c^*) = \delta$), $\delta > 0$ 且 $\delta \neq 1$,如果 $\delta = 1$,则 $U(c^*) = \ln c^*$ 。

假定该代表性居民在其生命续存期内,在既定约束条件下在消费和储蓄之间进行选择,最大化其效用水平:

$$\begin{aligned} \text{Max} E_0 \sum_{t=0}^{\infty} \beta^t U(c_t^*) \\ \text{s. t. } A_t = A_{t-1}(1+r) + Y_t - C_t - G_t \end{aligned} \quad (3)$$

上式中, A_t 表示 t 期末的实际金融资产,在两部门经济中,它也就是政府的实际债务水平。 A_{t-1} 表示 $t-1$ 期末的实际金融资产, r 表示实际利率, Y_t 表示 t 期收入, C_t 为人均实际消费支出, G_t 为人均实际政府支出。

假定实际利率 r 为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常量,消费者对个人劳动收入有完全的预见能力,令 $c^* = c_t g_t^\phi$, ϕ 表示人均实际消费支出与人均实际政府支出之间的关系系数。则最优化方程(3)可变为一个确定条件下的消费者决策模型,其 Lagrangean 函数为:

$$E_0 \left| \sum_{t=1}^{\infty} \beta^t (U(c_t^*) + \lambda_t (A_t - [A_{t-1}(1+r) + Y_t - C_t - G_t])) \right| \quad (4)$$

其中, λ_t 为 Lagrangean 乘数,在本文中,它度量的是财富的边际效用。对上式进一步求解,得一阶条件如下:

$$\frac{\partial U_t}{\partial c_t} = \frac{\partial U_t}{\partial g_t} = -\lambda_t \quad (5)$$

$$E_0 [\beta(1+r)\lambda_{t+1}] = \lambda_t \quad (6)$$

$$\text{由 } \frac{\partial U_t}{\partial c_t} = \frac{\partial U(c_t^*)}{\partial c_t^*} \times \frac{\partial c_t^*}{\partial c_t}, \frac{\partial U_t}{\partial g_t} = \frac{\partial U(c_t^*)}{\partial c_t^*} \times$$

^①Arrow 和 Kurz 于 1970 年最早将政府支出引入居民消费效用函数^[20],Barro、Turnovsky 按政府支出明细来最终确定进入效用函数的组成部分^[21]¹⁰⁶^[19]⁹⁸⁻¹⁰¹,本文在理论分析中忽略了政府支出类型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frac{\partial c_t}{\partial g_t}$, 从等式中解出 λ_t 及 λ_{t+1} , 代入等式(6)中, 有:

$$c_t^{-\delta} g_t^{\varphi(1-\delta)} = E_0[\beta(1+r)c_{t+1}^{-\delta} g_{t+1}^{\varphi(1-\delta)}] \quad (7)$$

对上式两边取对数并进行整理得到:

$$\ln c_{t+1} - \ln c_t = \frac{1}{\delta} \ln \beta(1+r) + \frac{\varphi(1-\delta)}{\delta} (\ln g_{t+1} - \ln g_t) \quad (8)$$

在式(8)中, 当 $\frac{\varphi(1-\delta)}{\delta} > 0$ 时, 政府支出增加将导致私人消费增加, 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呈互补关系; 当 $\frac{\varphi(1-\delta)}{\delta} < 0$ 时, 政府支出增加将导致私人消费减少, 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呈替代关系; 当 $\frac{\varphi(1-\delta)}{\delta} = 0$ 时, 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不存在任何相关关系, 即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呈中性。

(二) 对李嘉图等价的进一步说明

以上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结果表明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消费者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及私人消费支出与政府支出之间的相关系数等因素。然而, 政府支出的融资方式选择是否也会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 Ricardo 和 Barro 对这个问题分别进行了研究, 二者均认为在财政支出水平既定的情况下, 政府是通过征税还是发行债务来为支出融资, 对经济的影响是等价的, 融资方式相对数量的变化对总需求、利率和资本形成都没有影响, 即 Barro-Ricardo 等价^{[22][21]122}。根据 Barro-Ricardo 等价原理的政策启示, 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无效的, 不会影响到社会总需求的变化: 因为在减税的情况下, 家庭把减税而增加的可支配收入储蓄起来, 以支付目前减税所导致的未来税收负担, 减税并没有提高私人部门的消费; 而在政府支出增加的情况下, 消费者理性地预见到目前发行的国债等同于未来的税收, 消费者则像政府现在增加税收一样减少消费, 这样政府增加的支出与消费者消费的减少正好相等, 总需求不变。后来, 许多经济学家分别站在政府和个人角度, 利用政府跨时预算约束和生命周期假说或永久性收入理论, 论证了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然而, 由于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需要有许多前提条件, 而有些条件在理论和实践上难以得到满足, 因此, 也有许多经济学家从理论及

经验角度出发对李嘉图等价定理提出质疑。Tobin 从消费者是否是世代利他主义者、以举债取代征税是否发生再分配效应以及政府所课征的税收是否是一次总付税等角度, 论证了李嘉图等价定理不成立^[23]。Mankiw 则从人们是否是短视的、是否面临有约束力的借债约束以及代际间是否存在财富再分配等角度, 分析了李嘉图等价定理不成立的原因^[24]。Dalomagas 利用协整方法, 经验检验了李嘉图等价定理难以成立^[25]。Feldstein 基于消费函数模型, 运用 2SLS 估计方法, 证明了李嘉图等价不成立, 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支出没有影响^[26]。在中国, 李嘉图等价定理是否成立? 如果成立, 那么我国自 1998 年以来以增加国债发行扩大内需的反周期政策可能是没有效果的。因此, 我们有必要对李嘉图等价定理进行经验检验。

三、计量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及分析方法

根据前面理论模型推导我们看到, 式(8)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 但由于理论模型是抽象掉其他因素的, 即假设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推导得来的, 在用式(8)做实证分析时, 如果其他经济变量不满足模型的隐含前提或遗漏其他重要的解释变量, 则估计是有偏的。同时, 由于个人可支配收入也是决定个人消费支出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在式(8)中忽略个人可支配收入对个人消费支出的影响, 则政府支出与消费支出的关系将会弱化。有鉴于此, Hung-wu Ho 提出: 在式(8)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为解释变量, 在有效分离出其他因素对消费的影响的同时, 还可以得到一个一致的估计, 从而更真实地反映政府支出对消费的影响^{[11]95-108}。因此, 模型中我们还增加了个人可支配收入作为解释变量来研究中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长期均衡关系。具体估计方程如下:

$$\ln C_t = \alpha_0 + \alpha_1 \ln G_t + \alpha_2 \ln Y_t^d + \xi_t \quad (9)$$

其中, α 为待估参数, Y^d 为个人可支配收入, ξ 为随机误差, ξ 服从均值为 0、方差为 σ^2 的独立正态分布。由于传统的计量经济模型估计方法, 如普通最小二乘法、广义最小二乘法和极大似然法等, 都有它们的局限性, 其参数估计量必须在模型满足某些假设时才具有良好的性质。而广义矩估计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 是一个

稳健估计量,因为它不要求扰动项的准确分布信息,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所得到的参数估计量比其他参数估计方法更合乎实际。此外,GMM 包容了许多常用的估计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广义最小二乘法和极大似然法都是它的特例。因此本文经验分析采用 GMM 方法来估计。

(二) 变量的选取及数据说明

本文的考察期间为 1978 年至 2007 年,数据为年度数据。用经过价格调整的人均实际居民消费度量居民消费。中国人均政府支出由中国政府购买性支出与年平均人口数之比得出,其中,中国政府购买性支出由中国政府总支出减去“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及“政策性补贴支出”得出,年平均人口数为上年人口数与今年人口数的算术平均值。人均国民收入由总国民收入与年平均人口数之比得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人均国民收入与人均净税收之差得出,其中人均净税收由人均税收与人均政府转移性支出之差表示,政府转移性支出包括“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以及“政策性补贴支出”。政府债务由年末扣除利息支付后的

国债存量表示。原始数据均来源于相应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并经以 1978 年为基期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调整为相应各年的实际变量数据得出。

四、经验分析

(一) 平稳性检验

由于在计量模型中使用的数据均为时间序列数据,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对计量模型中涉及的各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 ADF 单位根检验来验证各变量的平稳性。表 1 的平稳性结果显示,各变量的原序列均为不平稳序列,大部分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为平稳序列。如果采用常规的办法对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统计推断时会存在严重的伪回归问题,而对原序列进行一次(或多次)差分,用差分后的平稳序列建立回归模型,会导致原序列之间长期关系信息的丧失。因此,为避免伪回归及信息缺失,模型估计前,我们对各变量数据序列采用 H-P 滤波方法处理,得到各变量的平稳序列后再进行模型估计。

表 1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C,T,P)	ADF 值	AIC 值	变量	检验形式(C,T,P)	ADF 值	AIC 值
lnC	(C,0,3)	-2.319320	-1.877303	ΔlnC	(C,0,2)	-4.450421 **	-3.588292
lnG	(C,T,3)	-3.756167	-3.588292	ΔlnG	(C,T,3)	-3.468621	-2.449634
lnYd	(C,0,2)	-2.797531	-1.449634	ΔlnYd	(C,0,3)	-2.636487 **	-1.581740
lnY	(C,T,2)	-1.424235	-0.154688	ΔlnY	(C,0,3)	-2.936027 *	-2.365990
lnT	(C,0,2)	-2.574890	-1.821436	ΔlnT	(C,0,3)	-3.751421	-1.577303
lnB	(C,0,2)	-3.1357862	-2.724215	ΔlnB	(C,T,3)	-2.005690	-0.415937

注:①检验形式(C,T,P)中 C、T、P 分别表示模型中的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项;②ADF 检验采用麦金农(Mackinnon)1% 显著性水平下临界值;③*、** 分别表示在 1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在相应的显著性水平下认为变量是稳定的;④一阶差分用记号“Δ”表示。

(二) 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的长短期关系经验结果

通过以上平稳性检验,采用经 H-P 滤波处理的各项变量序列,对式(9)用 GMM 方法估计,可以得出政府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等变量对居民消费产生的长期影响。结果如下:

$$\ln C_{hp} = 2.140 - 0.309 \ln G_{hp} + 0.988 \ln Y_{hp}^d \quad (10)$$

(2.527) (-2.006) (14.934)

$$R^2 = 0.9736 \quad D-W = 1.805$$

为衡量居民消费的短期变动趋势,以方程(9)式为基础,同时增加方程的滞后项,建立一个

分布滞后模型,以研究中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短期动态过程。由于 $\ln C_t$ 、 $\ln G_t$ 、 $\ln Y_t^d$ 的差分项均为平稳序列,可以直接进行回归分析。最后结果如下:

$$\Delta \ln C_t = 0.184 \Delta \ln G_t - 0.339 \Delta \ln G_{t-1} + 0.260 \Delta \ln G_{t-2} + 0.885 \Delta \ln Y_t^d \quad (11)$$

(1.723) (-2.464) (2.717) (11.878)

$$R^2 = 0.749 \quad D-W = 2.242$$

以上回归结果表明:短期内中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即政府支出的增加将导致居民消费的增加,由式(11)可以看出,人均政府支出增长 1 个百分点将拉动同期居民消费支出

0.184 个百分点的增长。而在长期中,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则呈替代关系,即当经济系统经过充分调整达到长期均衡时,中国政府支出将完全挤占居民消费。由方程(10)可以看出,在达到长期均衡时,居民消费支出对政府支出的支出弹性为-0.309,即政府支出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导致居民消费支出减少0.309个百分点。考虑到近年来中国政府支出水平约为居民消费支出的二分之一,居民消费支出减少0.309个百分点相当于政府支出完全挤占了居民消费支出。

(三) 对李嘉图等价命题的进一步检验

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对于一个既定的政府支出路径,政府融资方式对资源配置没有影响。换句话说,政府无论是通过发行国债还是通过征税来为政府支出融资都不会影响居民的消费。考虑到对李嘉图等价定理进行计量经济分析时存在诸多不易解决的困难,因而许多经济学家在实证研究中很难取得一致结论。鉴于此,为检验李嘉图等价定理在我国是否成立,我们以总需求函数为基础构建计量模型进行检验,其中消费支出为因变量,收入、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变量为自变量。如果税收和国债等自变量的系数显著地异于0,我们就可以拒绝李嘉图等价定理^①。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ln C_t = \beta_1 + \beta_2 \ln(Y - T)_t + \beta_3 \ln(T - G)_t + \beta_4 \ln B_t + e_t \quad (12)$$

其中, C 为居民消费, Y 为国民收入, T 为税收收入,则 $(Y - T)$ 代表可支配收入, B 是国债存量, $(T - G)$ 代表政府的财政赤字(或财政盈余)。上式中,如果参数 β_3 和 β_4 显著地异于0,则李嘉图等价定理不成立。沿用GMM方法对式(12)进行估计,可以得到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财政赤字、债券、财富等4个变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如下:

$$\ln C_{hp} = 948.355 + 0.554 \ln(Y - T)_{hp} + 1.318 \ln(T - G)_{hp} + 0.188 \ln B_{hp} + e_t \quad (13)$$

(3.6806) (8.3564) (2.1526) (2.7631) (4.9801)

$$R^2 = 0.998362 \quad D-W = 1.58162$$

由于 B 的系数为0.188,财政赤字的系数为1.318,两个系数都显著地不为零,说明国债和财政赤字的增加能增加居民消费,进而李嘉图等价定理在我国不成立。具体来说,每增发1元国债,可增加居民消费0.18元;财政赤字每增加1元,可增加居民消费1.4元,而税收每增加1元,可增

加0.76元的消费需求。

从上述经验分析结论来看,李嘉图等价定理在我国并不适用。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与通过征税来增加政府支出相比,通过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支出对总需求的扩张效应更大,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我国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在我国,或许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公债发行与未来纳税义务之间的联系,或许是因为我国的资本市场不完全,或许是因为居民储蓄率一直很高,或者是因为税收制度是以间接税为主的复合税制,通过债务融资的政府支出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居民消费的增长。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居民消费跨期最优化分析框架,从理论及实证角度分析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理论研究表明,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消费者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及私人消费支出与政府支出之间的相关系数。并以中国为例,在李嘉图等价框架下从经验角度分析了中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结果表明:在短期内,李嘉图等价不成立,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政府支出的增加将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即政府支出增加将导致居民消费增加,总体上表现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地拉动了内需的增长。但是在长期均衡时,政府支出将完全挤占了居民消费支出,从而得出结论:支出政策不宜用于实现政府的长期经济目标。

由于政府支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或产生挤出效应,或产生引致效应。因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采取短期扩张性的政府支出政策确实可以增加居民消费,提高社会总需求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如从1998年开始,政府连续几年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效缓解了市场供给过剩、库存积压的状况,增加了居民消费,扩大了总需求。但在经济达到长期均衡时,由于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财政政策不具有有效性,因此不宜用支出政策来实现长期经济政策目标。其次,要在长期内维持较高的居民消费进而维持较高的社会总需求,只有维持较

^①需要指出的是,该方法并未对居民根据对未来财政政策的预期进行消费决策加以体现,这点值得进一步探讨。

高的个人可支配收入或提高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才能达到。因此,从长期来看,我国政府应尽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特别是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收入。最后,为进一步引导居民消费,启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应进一步调整和改善政府支出结构及方向。在支出结构方面,应大力增加社会公共消费性支出及福利性支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而降低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促进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在支出方向上,更多地关注农村市场及农民消费的增加。目前,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拉动较少,但农村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政府将财政支出更多地投向农村,无疑会对增加农民的收入、培育更加成熟的农村消费环境、启动农村消费市场产生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Barro. 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 1974,82(6):1095-1117.

[2] Ramey, Shapiro. Costly capital reallocation and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spending[J].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1998,48:145-194.

[3] Burnside. Fiscal shocks and their consequences[R]. NBER Working Paper, 2003: 1-21.

[4] Mountford, Uhlig. What are the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shocks[R]. Discussion Paper, Tilburg University,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2000,31:1-31.

[5] Baily. National income and price level[M]. New York: McGraw-Hill, 1971:25.

[6] Kormendi. Government debt,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private sector behavior[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3,73:994-1010.

[7] Aschauer. Fiscal policy and aggregate demand[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75(1):117-127.

[8] Ahmed. Temporary and permanent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n open economy: some evidence for the United Kingdom[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6,17(2):197-224.

[9] Amano, Wirjanto. 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 and government spending[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7,79(4):605-609.

[10] Barro. Output effects of government purchas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1,84:343-350.

[11] Tsung-WuHo. The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private con-

sumption: a panel integration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1,10:95-108.

[12] Karras.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private consumption: 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994,26(1):9-22.

[13] Devereux.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increasing return and government spending[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996,28:233-254.

[14] Frenkel, Razin. Fiscal policies and growth in the world economy[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6:155-406.

[15] 刘溶沧. 论税收与经济增长: 对中国劳动、资本和消费征税的效应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1):67-76.

[16] 李广众. 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 替代还是互补[J]. *世界经济*, 2005(5):38-45.

[17] 李永友. 居民消费与中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基于居民最优消费决策行为的经验分析[J]. *世界经济*, 2006(5):54-64.

[18] 申琳, 马丹. 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 消费倾斜渠道与资源撤出渠道[J]. *世界经济*, 2007(11):73-79.

[19] Turnovsky. *Methods of Macroeconomic dynamics*[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5: 25-103.

[20] Arrow, Kurz. Public investment, the rate of return and optimal fiscal policy[M]. Baltimore: John Hopkins Press, 1970:23-67.

[21] Barro.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98:103-125.

[22] Ricardo.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208.

[23] Tobin. Government deficits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J]. *Contemporary Economic Activity*, 1980,2:23-46.

[24] Mankiw. Consumer durables and the real interest rate[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5,67(3):353-362.

[25] Dalamagas. The tax versus debt controversy in a multivariate cointegration system[J]. *Applied Economics*, 1994,26:1197-1206.

[26] Feldstein. Government deficits and aggregate demand[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2,9:1-20.

(责任编辑:杨凤春)

(下转第71页)